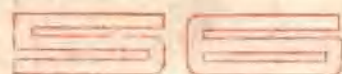


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

乙 冊

周 鼎 娃 編
趙 修 西 莫 娃 譯
進 西 莫 娃 譯
系 迎 西 莫 娃 譯
文 迎 西 莫 娃 譯
趙 修 西 莫 娃 譯
研究 專 承 翻
永 聯 文 承 翻
印 蘇 聯 文 承 翻



見 意 提 端
考 參 供 採
亦 經 脂 刀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1956—1957 學 年 第 二 學 期

文学史第二十三讲

B.Ф. 柯尔尊

讲题：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复活」的分析

在看手研究本讲讲题之前，必须简短地谈到八十至九十年代间的托尔斯泰的创作。

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写成的时候，正当托尔斯泰的世界观起着巨大变化的时候，特别是他对宗教的见解也在起着变化。在整个八十年代时期中他写了并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如「忏悔」，「我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怎么办？」等，而在九十年代则写了「我们内心的神的主宰」。在这些论文里托尔斯泰以新的方式提出并解决了许多道德伦理，宗教等问题。在「忏悔」里他写道：「我和我们的社会生活决裂了，我认为这不是生活，而只是象生活而已，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优裕条件使我们不可能理解生活，为了理解生活，必须去理解的不是一种特殊的生活，不是我们这种寄生的生活，而是要去理解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这些劳动人民创造了生活并赋予了生活以它的意义。」

这一切说明了，托尔斯泰是和劳动人民，首先是和农民相接近的，他有力地批判了剥削阶级及教会和专制的资产阶级政权的其他方面。他起来捍卫曾经被判处死刑的革命民粹派，日益深入了解到革命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是合乎规律的，虽然在那个时候革命还使他害怕。列宁发表的意见首先正是针对着托尔斯泰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的活动而言的，阐明了托尔斯泰见解的极度矛盾性，以及他当时反对现有制度的努力。正是在托尔斯泰这一时期里，在极大程度上是以「揭除一切和任何假面具」为其特色，「他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斥责政府的横暴，法庭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可笑，彻底暴露财富的增

加、文明的成就和大众贫困、堕落和苦痛的增加之间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他疯狂的宣传「不要以暴力抵抗罪恶。」」（译文见立华译「列宁著论托尔斯泰」第2—3页）

托尔斯泰的见解是在很长时间内形成的，我们能在他早期创作中追溯它的根源。但是正是在八十年代明显地标志出了托尔斯泰转到宗法社会农民立场的过渡，这伴随着对教会的大力批判以及托尔斯泰和他所习惯的社会生活条件的告别，以及节制自己的欲望而代之以个人体力劳动的意愿。

托尔斯泰的具有宗教主题的论文或者是在国外印行的，或者是秘密印行的。作者积极参加了救济饥民的组织工作，上书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抗议最高政权所作出的各种形式的正义的行为。

在他的论文中，托尔斯泰继续否定技术和文明，因为按照他的信念，这对人民是不会带来好处的。他写道：「让文明消灭，让正义战胜一切。」他号召大家放弃暴力，在平等、博爱、行善的基础上建立社会关系。他把理想的社会制度想象成为自由庄稼人的团结——特殊的宗法式的「基督教共产主义」。同时托尔斯泰不是从事物的现实情况；而是从抽象的道德、宗教立场出发的。他写道：「不能不承认，如果人做了几千年以前不仅耶稣基督，而且世界上所有圣贤人指定他做的事情，那就是不仅要爱人如己，而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人能一心以利他主义来代替利己主义，如果生活方式，象那些科学家用他们粗鄙的行话所表达的那个意思那样，从个人主义的方式转变为集体主义的方式，那末人的生活就不会是苦恼的，而将会是幸福的了。」

列宁在揭露托尔斯泰学说的空想和反动性质时写道：「作为一个发现了拯救人类的新药方的预言家，托尔斯泰是可笑的

——因此，那些想把他的学说的最弱的一面变为教条的外国的和俄国的「托尔斯泰派」，是最糟不过的了。作为千百万俄国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到来时代形成的观念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译文引自立华译「列宁著论托尔斯泰」第4页）

托尔斯泰对艺术的任务，尤其是对文学的任务的见解也改变了。过去他认为只有在人民中间产生出的文学才有真正的价值，以为拥有现代高度文化的作家是不可能创造人民所能理解的、接受和接近的作品的。现在托尔斯泰开始为人民创作作品了，但是他以为这些作品必须贯彻宗教原理以及顺从和不反抗的思想。同时他又象过去那样继续予人民口头创作以高度的评价。在八十年代托尔斯泰写了一系列教训性的故事，首先是准备给农民读的。1886年他创作了民间戏剧「黑暗的势力」，而在1890年则创作了「教育的果实」，我们将在下一讲里研究托尔斯泰的戏剧作品时熟悉这些作品。

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创作了一系列新的卓越的作品——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克列采尔奏曲」，「恶魔」，故事「主人和工人」，并开始写作中篇小说「谢尔盖神父」。

在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里面阐述了一个大官的生平和他的悲惨的死亡的故事。伊凡·伊里奇患了不可救药的病症，临危之际，他重新检查了自己的一生，相信他的一生是毫无内容的、是空虚的。同时他以恐惧和可怕的精神上的痛苦心情等待着那不可避免的结局。他看到，他家庭里的人都在忙于日常的塵世俗事，不理解他，也不想去理解他，他们把他的疾病看做只是一件扰乱着他们生活的事情。唯一的，到最后始终忠实于他，而且由衷地竭力想减轻他的痛苦的人是他的仆人。

格拉西姆。

当伊凡·伊里奇弥留之际，他恍然大悟了，神志清醒起来了，他抛弃了自己一切利己主义的思想，充满了对周围人们的深挚的爱。同时消失了对死亡的恐惧。基督的爱战胜了一切。

接着托尔斯泰指出，伊凡·伊里奇死后，周围的人继续走着他们从前所走的道路。伊凡·伊里奇的同事们由于伊凡·伊里奇所占有的职位的出缺而就心取务上的可能变动和升调。他的妻子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得到一笔巨额的抚卹金。伊凡·伊里奇的清醒丝毫没有改变他所亲近的人的生活方向。

这个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首先是它的叙述的极度的简练。所有的东西都服从于对一个人的命运的揭示。同时作者成功地鲜明描写了资产阶级社会，特别是建立在虚伪基础上的家庭关系的冷酷及伪善。

这个作品的现实主义和艺术表现力获得了许多最伟大的作家们的高度的评价。例如，当莫伯桑在阅读了《伊凡·伊里奇之死》后说道：「我看见了我的整个的活动都没有什么用处，所有我的十部著作都没有多大价值」。

在中篇小说《克利采长曲》中托尔斯泰对肉慾的爱给予了完全的和无条件的谴责，他肯定说，这种爱对于一个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都是有害的并且会使他犯罪。

这个作品的高度艺术价值首先乃是它极其深刻地描写了人的心理状态，而作者所得到的最后结论——则是作为基督教训条中的生活理想的禁慾主义和独身，这当然是非常错误的。

托尔斯泰创作的最后阶段，即自八十年代起的最伟大作品是长篇小说《复活》，这是他在1889到1899这个时期里写成的。由于这个长篇小说是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成熟时期里写成的，而这时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它便

给予了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以严重的打击并使其日益削弱。

长篇小说《复活》就其性质来说首先乃是一部揭露性的作品。在它里面表现了对托尔斯泰说来是很大力量的讽刺倾向，这并不是偶然的。托尔斯泰表现了千百万农民群众的意愿：《想彻底扫除官办的教会，地主及地主政府，消灭土地所有制的一切旧形式和旧程序，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共同生活来代替警察的阶级政府》。（列宁著《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引译文“马、恩、列、斯论文艺”89页）

同时托尔斯泰力图证明说，人的道德复活的道路只有通过宗教，即通过《你自己内心里的天国》。在这个长篇小说中他继续用很大的力量发展了他自己的反动的，空想的宗教道德学说。关于此，列宁说道：托尔斯泰《…不理解那向俄国逼来的危机的原因和避免这个危机的方法，这种不理解只对于家长制的天真的农民才是自然的，而对于受过欧洲教育的作家就不适合了》。（列宁著“列夫·托尔斯泰”引译文同上书第95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长篇小说《复活》中，托尔斯泰把它的重心从描写统治阶级生活转移到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和普通人们的命运上去了。同时托尔斯泰用着不可比拟的力量来揭露了剥削阶级的寄生性和为人民所切齿痛恨的那种制度的不可救药的痼疾。作者最终放弃了地主和农民可以和平共处的想法。

长篇小说《复活》的最初的构想乃是托尔斯泰所听到的一件诉讼故事。法院中的一个工作人员在法庭上遇见了为他从前所诱骗过的少女。为了挽回自己的过失，他便和她结了婚。

在许多年的写作过程中，作为这个作品的基础的道德—心理问题转变成了社会—政治问题。在长篇小说中出现了详尽的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图景，并提出了很多为他所关心的问题。

和托尔斯泰许多其他的伟大创作不同，长篇小说《复活》

是单情节的。但在同时也保存了欧洲许多基本形象的原则——对照法——这个原则乃是托尔斯泰固有的创作特点。这种方法在小说的开始就表现了出来，在这里作者举出了下列形象作为这个小说的基本形象，它们是：聂赫留朵夫和卡邱霞·玛丝洛娃，而在整个小说的结构上则指出了统治阶级生活的奢侈和群众的赤贫。

在描写聂赫留朵夫和卡邱霞·玛丝洛娃的最初一些画面中就揭示出了令人难于容忍的社会不公平。警卫者把被聂赫留朵夫所折磨的和损害的卡邱霞带到了法院里去。聂赫留朵夫公爵在这个时候还昏睡在他的华丽的卧室里。在描写聂赫留朵夫的时候作者指出了他的「宽肩膀」，「两条光光的白腿」，「那白皙、丰满、强壮、筋肉发达的身体」和「长长的指甲（汝龙译：复活，第16—17页）。聂赫留朵夫「正躺在他那高高的弹簧床上的鸭绒褥子上，穿一件干净的、缝着精致的横褶的、热得很平的细布睡衣」，他「抽着纸烟」（同上书第16页）。

聂赫留朵夫认为自己是一个正直的人。托尔斯泰也没有否认在他在年青的时候是的确具有着许多优良的品质和特征。但是在周围环境和寄生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下，他的性格大大的变了样儿。「在聂赫留朵夫身上，——托尔斯泰写道，——就跟在所有的人的身上一样，有两个人：一个是精神的人，专门为自己寻求那种能够促进全人类幸福的幸福；另一个是动物的人，却专门贪图自己的幸福，为了自己的幸福不惜牺牲别人的幸福。在眼前这个时期，他已经害了由彼得堡生活和军队生活所培养出来的自私自利的痼疾；在他身上，动物的人就占了上风，完全摧毁了精神上的人」。（78页）

于是聂赫留朵夫作为陪审员也参加了当前的审讯过程。审讯顺利而迅速地进行着，没有一点顿挫，而且多少显得有点庄

严。这种一丝不苟，这种有条不紊，这种庄严肃穆，明明使得那些参与的人很满意，更使得他们相信他们在执行重大的，有价值的，严肃的公务了。聂赫留朵夫也深深感觉到这一点。

（同上书 42 页）

他非常了解法院的成员，了解他们生活中的一切阴暗面。托尔斯泰详细地描写了这些人，并揭露了他们的隐秘的思想。他们对于自己负责来决定其命运的那些人们完全漠不关心。一个法官是浸沉于对自己疾病的思念中，另一个法官是幻想着与恋人的秘密约会，第三个法官是思念着同妻子的争吵，而助理检查官根本还没有从夜宴中清醒过来。于是就甚而来不及了解玛斯洛娃的案件，便起来宣读判决词了。

同被控告犯有杀害和劫掠一个商人这种罪行的卡邱霞·玛斯洛娃的相遇，使聂赫留朵夫感到震惊。在他面前站着一个变成粗野的，受了摧残的，面带「死相」的妇女。而聂赫留朵夫却知道她在过去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这曾是那个令人着迷的穷家姑娘，她在一个富豪的地主家中处于一半奴婢和一半养女的位置，而聂赫留朵夫就是这个家庭中的熟客。他利用了这个姑娘的未婚世故；就诱骗了她。而这种事情在他看来乃是他周围最接近的那些「花花公子」中间的一些人的普通故事，平常的行为。

在卡邱霞·玛斯洛娃的生活中，这段历史却有着极其艰苦的后果。庇养者把她撵出到大街上以后，她就孤苦另丁地陷入悲惨生活之境而身无分文，她失去了正常生活的可能。很快地她就沉落到妓院中、卖淫的生活深深地使她感到痛苦。她对于在世界上还存在有善良和真理丧失了信心。

聂赫留朵夫同卡邱霞的相遇就肇始了他的观点的根本改变，和在觉醒着的良心与理想日益浑浑噩噩生活的愿望之间的痛苦。

苦斗争。

托尔斯泰是真实地、连贯地描写了聂赫留朵夫的精神觉醒。同卡邱霞的第一次相遇就引起了他的震惊。他之所以恐惧是由于她知道他，而且她将会说出她的悲剧历史的真正的罪人——聂赫留朵夫。他当时是希望审判手续尽快地结束，他想道：「唉，快点才好。这时他感到恶心，怜悯，烦躁，就跟出去打猎，打伤一只鸟，不得不弄死它的时候的心情一样。受伤的鸟在猎物袋里拍翅膀。人觉着恶心，可又觉着可怜，就赶快打死那只鸟，忘掉它了。（同上书100页）

托尔斯泰是以显然地责难的笔调来描写聂赫留朵夫的，而在描写他的心情时，托尔斯泰又运用了鲜明的讽刺语和反面的比较：「他觉得自己活象一条叭儿狗，主人一把揪住牠的脖子，按着牠的鼻子，在牠弄得一团糟的东西上擦来擦去。叭儿狗哀叫，往后退缩，已不得远远的躲开牠做出来的错事，已不得忘掉它才好，可是铁面无私的主人却不放松它了。（同上书114页）

聂赫留朵夫转注于过去的往事，并批判地回顾了已逝的岁月和自己的行径。「一块可怕的幕，原本微妙的遮住了那以后十年中间他的生活，现在却抖动起来；他不时的窥见幕后面藏着的东西了了。（同上书114页）他愈来愈严格地来评价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一般的生活道路：「我要对她说，对卡邱霞说：我是坏蛋，我对她犯了罪，我要尽我的力量减轻她的厄运。对了，我要去见她，求她宽恕我了。（同上书152页）

随着聂赫留朵夫走上了悔悟之途，托尔斯泰就改变了自己对他的态度，但是对于聂赫留朵夫不是真心地决定要与卡邱霞结婚这一点还是不饶恕他的。因为在这个时刻，他还是继续更多地想到了自己，而想到卡邱霞的则就比较得少。他在同她在

监狱中会见之后，就向她说出了自己的愿望。但卡邱霞马上感觉到指导着他的与其说是想在她面前来纠正自己罪过的愿望，不如说是他要给自己开脱和使自己得到安宁，被侮辱了的卡邱霞怀着憎恶的心情向聂赫留朵夫说道：“走开，我是犯人，你是公爵，这儿没有你什么事！……你在这个世界里拿我玩乐还不算，又要用我来救你自己，好让你上天堂！”。（同上书241页—242页）

卡邱霞的这些话不仅揭露了聂赫留朵夫，而且也揭露了托尔斯泰本人关于聂赫留朵夫这类人复活以及用此道路来解决复杂的生活和社会矛盾的可能性的全部宗教哲学观念。

只是后来，当聂赫留朵夫了解到可怕的环境是怎样有力地毁灭了卡邱霞·玛丝洛娃的时候，他才充分地能够评价自己行为的全部的重荷，现在在他看来，他的行为已是罪行了。聂赫留朵夫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就开始改变了自己的贵族生活方式。

聂赫留朵夫决定要随同判处劳役的卡邱霞到西伯利亚。他为了——一些政治犯和刑事犯奔走于权贵之前，详细地了解了监狱的生活和监狱当局。情况迫使他必须与自己的处在极端贫穷境地的农民作亲密的交往。他打算改善他们的地位，和很便宜地卖给他们土地。但是他的与农民接近的企图引起了农民们的不相信和嘲笑。一个贫穷和无权的可怖世界展开在这个悔悟的地主的面前。下面就是他在农村中同农民的孩子们谈到一些孤苦的妇女们时的情况：

“那么她丈夫在哪儿呢？”

“在监狱里喂虱子呐，”大孩子用农民中间常说的一句话说。

“一年以前，他在东家的树林里砍倒了两棵桦树，所以，”

他给关了起来。——穿淡红色衬衣的小男孩连忙解释道，——现在他在那儿已经关了六个月了，老婆只好讨饭，家里有三个孩子和一个害病的奶奶了，他接着详细的说。」（同上书317页）

聂赫留朵夫渐渐地真切地看清了苦难人民的悲惨情景和压迫人民的统治阶级的一切丑恶。聂赫留朵夫愈来愈与本阶级疏远了，从本阶级中挣脱出来了，抨击并终于轻视了本阶级。这也表现在聂赫留朵夫同智己姐夫，同姨母伯爵夫人查尔斯卡娅以及同许多的官吏、将军和活动家的谈话中。对上流社会环境的否定态度，在托尔斯泰的身上加强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在《复活》这部小说中连一个来自贵族环境的正面形象都没有。托尔斯泰是从反面描写了柯尔查庚将军和他全家的生活。聂赫留朵夫在同柯尔查庚相见时，不由自主的想起他所知道的，关于这人的残忍性格，上帝知道为了什么，——就因为他有了钱财，有了势力，他不需要讨好别人，当他在边区当首长时，任意鞭打和甚至于绞死很多人了，（同上书133页），他的妻子——一个「伪善的」，「虚假透顶的」妇女了，是充满了神秘主义。

作者就这样通过聂赫留朵夫的感受使读者认识了俄国社会生活和国家制度中的各个方面。同时一些最有揭露力量的话是由作者自己来说出的。

旨在反对基督教及其教会人士的那些反教权扩张性质的篇幅都充满了尖锐的批判。对于在狱中教堂里作礼拜仪式的情景的描写，就揭露了教会教条的全部虚伪性。在礼拜之后，囚犯们都得了圣步：「神甫一面跟典狱长谈天，一面漫不经心的伸出十字架和自己的手去，有时碰着犯人的鼻子……」（同上书200页）犯人们的镣铐声伴随着这一程序。再如对于象在污秽的，发臭味的监狱环境中的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画像，锁

锤和十字架这样一些琐细事物的安排描写也都具有着揭露的性质。

卡邱霞·玛丝洛娃也正是陷入到这种环境中，聂赫留朵夫现在正力图减轻她及其周围人们命运中的厄难。

卡邱霞的形象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占着一个特别的地位。他是第一次把一个来自人民中的女子作为小说中的主要的主人公，详尽地描写了她的过去（一个年青姑娘的富有诗意的形象）和现在（一个完全醜陋的、粗野的、为淫荡生活摧残了的妇女）。我们是在法庭的场面上碰到她。L在这个脸上，特别是在这惨白的脸上有着两只又黑又亮的眼睛，虽然浮肿，却仍旧放光，其中有一只眼睛稍稍有点斜睨。她站得笔直直... 7。（同上书7页）

聂赫留朵夫关于卡邱霞的回忆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他们恋爱的历史。聂赫留朵夫是怀着很大的温情和内心的满足来回忆他们的关系的，但同时也为自己的卑贱行为而感到了痛苦的羞耻。当他摔开这个受了骗的姑娘时，他用信封装了一百卢布交给她：L她猜出了他的话的意思，——托尔斯泰写道，——就皱起眉毛，摇摇头，推开他的手了。（同上书96页）而在以后，悲惨的生活就迫使她去接受其他男子们的这种侮辱性的赏赐。正如托尔斯泰所说的那样，在这个来自人民中间的姑娘的身上发生了L一件普通的故事，她变成了一个妓女。

卡邱霞的以后的生活事件充满了悲剧，整个的环境，一切同她相遇的人，都是继续地把她推向了生活的最边缘，而最后她陷入深渊中去了。她在妓馆中渡过了八年的可怕的生活。托尔斯泰说道：L从那天起，玛丝洛娃就开始了违反人类和上帝的长期罪恶生活：这是成千成万的妇女不但得到政府许可，而且得到政府奖励，纯粹为了促进国民幸福而过着的生活？。（

同上书 15 页)

卡邱霞在这种被迫而从事的动荡生活中变得心神鲁钝了，而为了完全不想自己的处境——她就常以酒浇愁。这样一个美貌的、善良和真诚的女子就变成了一个心灵已死的人了。她在监狱中不知道自己也是处在许多受到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压迫的无辜而受难的人们中间。同这些人们的交往，而后与聂赫留朵夫的不期相遇，就渐渐地唤醒了她的漠然的真正人的情感。这表现在她的想帮助自己同伴们来了案的愿望上。她常常向聂赫留朵夫请求这种事情。渐渐地在她身上又重新燃起了和加强了对聂赫留朵夫的爱情，而她也戒绝了自己的许多坏习惯——戒除了烟酒，并断然地拒绝了那些来纠缠她的男人。

卡邱霞的最终复活是在她于监狱中所遇到的那些革命者的影响下进行的。她很容易的，一点不费力的了解了指导着那些人的行动的动机，她自己既是平民中的一份子，就充分的同情他们。她明白他们跟平民站在一边，反对上层阶级；他们当中有些人，原是属于特权阶级的，却为了平民而牺牲他们的特权，他们的自由，甚至他们的生命，这就使得她特别看重他们，佩服他们了。(同上书 544 页)

卡邱霞在革新了生活之后，同时也就与聂赫留朵夫永远地分离了，虽然他还是继续地爱着她。而在这个时候她所想到的与其说是自己，不如说是他。她已意识到，他，一个贵族是不可同自己的环境决裂来同她寻求幸福的。社会的差别原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墙，他们俩是不能来克服它的。而卡邱霞又不想接受聂赫留朵夫的牺牲，她的伟大心肠和高出于聂赫留朵夫的地方也就又一次地表现在这里。

这个受到贵族如此糟蹋的姑娘重新又在普通人民中间获得了自己的人的尊严，过去一个偶然的事件曾暂时把她从普通人

这中间革除了。这样，托尔斯泰就又一次地强调指出，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都是与劳动人民联系着的，他认为劳动人民的优秀的儿子是那些在监狱中和在劳役中带着手镣脚铐的人们。

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把视线注向了革命及其活动者——民粹派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方面。他依然不承认革命斗争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他把革命者看作是人民的保卫者，因而同情他们。在描画革命者时，托尔斯泰渗入了自己的一些特点，往往使他们遵照着自己的理想。他把革命者描写成是一些具有崇高道德和精神品质的人们。例如，玛利亚·巴甫洛夫娜·谢吉尼娜，西蒙松，克里尔左夫，纳巴托夫等人就是如此。但是他们虽然关于善事谈论得很多，虽然力图想给周围人们来作这种善事，但是实际上完全丧失了在行动中来表现自己的可能。在这里又一次地表现出了作者的不反抗的情绪，和他的想以抽象的计划，以道德问题的观点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愿望。

托尔斯泰斥责了民粹派的「英雄」与「群氓」的理论，揭示了民粹派处境的悲剧。甚至当他们与来自人民中的一些人们同处在监狱中的时候，也依然是不理解这些人的，虽然他们也正是为人民的未来幸福而斗争的。

在小说中也遇到有一些工农出身的革命者。革命工人玛尔盖耳·康德拉节夫「做了一次大罢工的领袖，那次罢工的结果是工厂被毁，厂长被杀，他又被捕，被判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同上书 584 页）

康德拉节夫并不害怕体力工作，但是「他顶着重的是监狱中和休息站中的闲暇，因为这使他能够继续读书；现在他在仔细的读卡尔·马克思的第一卷，他小心在意的把那本书放在行囊里，随身带着，仿佛是一宗大宝贝似的」。（同上书 584—585 页）

托尔斯泰在指出康德拉节夫性格中的许多优点时，并没有对他表示出同情，而且也不了解革命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正如屠格涅夫在当时所作的那样，托尔斯泰虽然称赞革命者的优良道德的品质，但是对于他们的革命目的和活动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同情。所以革命者克里尔左夫只是发来了一些反对敌视人民制度的最激烈的言说，就在小说的结束时死去了，这并非偶然的。聂赫留朵夫看着死去的克里尔左夫就不禁地自问道：「为什么他一直受苦？为什么他一直活着？现在他明白了吗？」（同上书 649 页）

托尔斯泰描写了 L 生活中的可怕的罪恶，但不敢于最终地来回答这个主要的问题：同这种罪恶作斗争的基本道路何在——通过宗教或是通过革命？既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托尔斯泰就不可能放过那些年代中的象革命运动这样的俄国生活的现象。他猜测着真理是在革命者方面，所以在小说中也就描写了他们。但是他却不能完全倒向他们这一边来创造出当时领导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先进战士形象。而马克西姆·高尔基则已经能够向这一方向，往前再迈进一步了。

托尔斯泰在 1905 年所写的日记中的一段记事曾令人吃惊地暴露了他的世界观的矛盾性：「俄国革命必须摧毁现有的制度，但是不能用暴力，而只能消极地反抗。」这种矛盾性使托尔斯泰不可能彻底地毫不歪曲地描写革命者，虽然在某些场合下他也能在他们的形象中强调出一些典型特征。

这部长篇小说的形象结构特点是在于，在发展中描写了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这两个主要形象。其余一些形象则按照已经固定了的形象写出来的。关于卡邱霞和聂赫留朵夫之间的关系的故事是作品的基础。采用回想聂赫留朵夫和卡邱霞年青时

期的关系的情景的前期历史也应该是结构特点之一。因此作为小说开端的，愉快的，晶莹夺目的春日风景具有着象征的性质。它同人所造成的生活中的畸形现象以及不正常的社会环境成一对照。小说在大体上富有对照的图景，这些图景把被掠夺的、颠沛流离的人民的生活和富人，执政者，寄生虫的生活作了对比。贵族柯尔查庚等人坐在「驾着四匹和三匹悬着叮叮当当铃铛的肥马」的富丽堂皇的马车里，「胖太太带着插上贵重羽毛的帽子」，在这些人脸脸上「标志着安宁、自负和富足的神情」。而旁边则是衣衫褴褛的工人，「痛苦的，晒黑了的，干瘦的脸」，「粗布的家里有自己做的衣服」，「真正劳动生活和人生的真正兴趣、欢乐和苦难」。

这种对照的目的在于揭露「罪恶世界」，揭露一切破坏人民正常生活的反面事物。

另一些艺术手段和手法也都服从着这一基本目的。在小说里，照例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具有着反面的形象特点。例如，西伯利亚将军是一个「虚胖浮肿的人，有一个马铃薯似的鼻子，额头上有一个凸出的肉瘤；秃顶，眼下浮肿」。贵族柯尔查庚有一张「红脸，以及贪吃的、喷吧着挺响的嘴唇」，「肥脖子」，「营养丰富」，「健壮、自负、贪吃的人。」副省长玛斯列尼可夫的肖像则以这些特点为其特色，如「胖而红的脸」，「胖身材」，「漂亮的」缝制得「最新式」的服装。作者以这些细节强调了他的面貌如「从带有金袖钮的衬衫袖口里」伸出来的「白而肥大的带着蓝宝石戒指的拳头」。这一「白而肥大的拳头」是和玛斯列尼可夫说到他已经改善了犯人的生活情况的词句直接联系着提出来的。事实上这位省长并没有停止体刑，虽然官方是禁止施行体刑的。但是「白而肥大的拳头」正是专横和暴行的化身，无论如何这是省长面貌中最主要的一点。

同时，作者却怀着敬意和同情来描写普通人的肖像，突出了他们身上那些足以证明他们的崇高品质、智慧、善良和力量的特点；「端正的」容貌，「智慧」，「严肃」的面容，「晒黑了的额头」，「强壮的双手」，老人们的「优美的家长式的头」。托尔斯泰笔下的肖像永远是一个人的灵魂的面容，反映着他内部生活的极其微细的变化。要理解这一点，只要追溯着卡邱霞·玛斯洛娃的肖像的变化，从她年青的日子起直到小说终结时和她告别时止。

在描写富人和穷人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就将他们的生活作了一个比照。例如，查尔斯基伯爵相信：「跟鸟雀天生来要吃虫子果腹，身上披着羽毛，在空中飞来飞去一样，他也天生来要吃由工钱很高的头等厨师烧出来的，顶精致顶珍贵的食品，穿顶舒适顶贵重的衣服，坐顶好顶快的马所拉的马车，因此这三样东西应当永远给他准备得齐齐全全才成」。（同上书375页）。至于他的行为本身，那就合乎道德也好，不合乎道德也好，对于整个俄罗斯帝国，甚至对于全世界，会生出极大的益处也好，会生出极大的害处也好，他是完全不在心上的（同上书376页）。

大人先生们参加游艺会和音乐会，沉醉于酒色和淫乐。他们是由镶金、象牙、青铜、漆器、天鹅绒、花边以及一切为人民在很多世纪中所创造出来的那些珍贵东西装饰起来，显得金碧辉煌。

而农民和工厂工人的生活则被描写成另一个样子。农民们住在小和破旧的屋子里，脚穿「树皮鞋和农夫靴」，身着「破旧的外衣」和「肮脏的衬衫」。他们瘦削、面色苍白、劳苦不堪。当县赫留柴夫访问了一个农家之后他询问他们吃什么「你们午饭有些什么吃的？」「我们的午饭？我们的吃食可